

晋腔贯古今 梨园续薪火

晋剧,又称山西梆子,属汉族地方戏曲范畴,主要流行于山西中北部、内蒙古及陕西北部等地区。其艺术特点鲜明,旋律婉转流畅,曲调柔美元润且亲切自然,道白清晰明快,饱含晋中地区浓郁的乡土气息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,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。

晋剧起源

黄河沃土孕育的戏曲根基

山西素有“中国戏曲摇篮”之称,广袤厚重的黄土地与奔腾咆哮的黄河,不仅塑造了山西人民矫健豪爽、意志坚定的人文特质,更孕育出一批激昂奔放、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。从唐代的上党皮黄、雁北道情,到宋元杂剧,再到明清之交的蒲州梆子(以下简称蒲剧或蒲梆)、孝义皮影、太原秧歌、祁太秧歌等,这些戏曲形式不仅为城乡民众增添了生活乐趣与精神享受,更以“广场文化”“高台教育”的独特方式,让无数目不识丁的民众初步了解中国历史梗概,分辨历史人物的真善美与假恶丑,在潜移默化中开启民智、明辨是非、陶冶情操,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。

蒲剧作为晋剧的重要源头,于明末清初在陕西梆子戏秦腔的基础上逐步形成,至清代乾隆年间走向兴盛,并伴随晋陕商人的足迹分南北两路流动演出。南路戏班经河南向湖北、安徽、江苏等地辐射,被当地民众称为山陕梆子;北路则分为两支,一支沿京陕官道经洪洞、灵石、平遥、榆次流向河北保定府及北京,另一支经太原、忻州、大同出东、西两口(张家口、杀虎口),抵达张家口、宣化、归化(今呼和浩特)、包头、集宁等地。无论在京都还是口外,观众均因戏班源自山西,统称其为山西梆子。

清代道光中后期,蒲剧发展迎来鼎盛,艺人荟萃、班社林立,纷纷向外流动拓展。其中,北上京城的蒲剧班社一度轰动京师,声名鹊起,令古老的昆曲、新兴的京剧及远道而来的徽剧、汉剧等都难以匹敌,这便是民间谚语“道光皇帝登龙廷,山西梆子又时兴”的由来,也为后续晋剧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与群众基础。

戏剧盛况

清代晋中戏曲的多元图景

清代中期,戏曲在晋中地区

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,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,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:

其一,以戏酬神的民间习俗盛行。自元代戏曲形成以来,以戏酬神的传统便逐渐养成。清代中期的晋中城乡,尊神重鬼的封建迷信思想仍较为浓厚,寺、庙、庵、堂、祠、坛、阁、洞等宗教与祭祀场所星罗棋布,供奉的家神、鬼神、自然神及佛道儒三教偶像多达百余种,庙会演戏因此成为普遍现象,戏班通过为神献艺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。

其二,以戏助商促进物资流通。明代中期中蒙“马市交易”开启后,晋中民众的经商意识逐渐觉醒。至清代中叶,晋中商人经营的钱庄、典当、绸缎、花布、粮油、茶叶、药材、皮毛等行业的分庄分号已遍布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。为活跃市场、促进物资交流,无论内地还是外地的晋商,均普遍采用演戏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。由于多数商铺总号与东家集中在内地,晋中城乡围绕商务活动的戏剧演出愈发频繁。

其三,以戏夸富彰显豪门气派。随着晋中商人财富的积累,各府州县城乡涌现出一批以宗族为核心的豪门大户。道光年间“山西票号汇通天下”,部分富商大贾的财富甚至可与皇家国库匹敌。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,这些豪门不仅带头捐资组织各类演戏活动,还在自家宅院修建精美乐亭戏楼,每逢生日满月、婚丧嫁娶、老人祝寿等喜庆吉日,便单独出资聘请顶尖戏班与名角演出庆贺,以观赏名角表演彰显自身地位与财力。

其四,群众喜闻乐见形成寓教于乐风尚。蒲剧在晋中各地演出频繁且技艺精湛,深受民众喜爱。即便相距十里二十里,民众也会不分昼夜结伴前往观看,太谷民间戏谚“太谷烂胡村,把看戏当作正营生”“东怀远村的闲街汉,哪里唱戏哪里看”,便是当时盛况的生动写照。榆次民众更是不仅爱看戏、评戏,还自发学戏、唱戏。深层而言,民众通过戏曲这一“高台文化”形式,在思想、道德、社交、家庭、爱情等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,明确是非界限,规范行为准则。此时的蒲剧已深度融入晋中民众

日常生活,其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充分凸显,发挥了戏曲文化特有的教化功能。

晋剧雏形

王亚元与四喜班的开创之举

晋剧的雏形源自榆次聂店村富商王亚元的创举。聂店村地处京省官道(北京至太原)的关键节点,是榆次境内什贴驿站与鸣谦驿站的连接点,也是通往乌金山煤窑与孟家井瓷窑的必经之路。这里商贾络绎不绝、旅店林立,成为榆次北乡的重要商埠“旱码头”。明代中期“马市”开通后,部分村民赴大同、宣化等地与蒙古族通商致富,至明末已形成“七张、八王、五李、三康”等二十余户望族富户。

王亚元所在的王氏家族便是当地八家王姓大户之一,祖上为知名吹鼓手世家,因乐器特殊、技艺超群,吸引了众多弟子拜师学艺。王氏祠堂献殿供桌上常年摆放着锣鼓笙箫等21件古老乐器,以此警示子孙不忘祖恩。王亚元生于乾隆晚期,8岁入私塾,16岁外出经商,40岁时被派往张家口、北京、苏杭等地的分店担任“坐客”,负责考察监督经营、传递信息。这一职务让他有充足时间在各地山陕会馆、茶园、戏园看戏赏戏,对家乡的蒲剧更是情有独钟。

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,王亚元离职回村,本想安享天伦之乐,却遭遇战乱,只得终日捐资护院、东躲西藏。咸丰八年(1858年)局势平稳后,他不仅重拾“饱食思乐”的习惯,更听闻各地分号掌柜抱怨家乡文化娱乐活动冷清。于是,王亚元决心凭借自身经济实力与戏剧知识,独创属于山西中路地区的新型剧种,同时也以此缅怀祖辈,回报传承祖业的外姓徒孙。

随后,王亚元召集太原县古城营高家班的高福贵、寿阳县中闫庄的胡虎儿等吹鼓手自传弟子,共同商讨新剧种的创建事宜,涉及板式唱腔、剧目选择、乐器伴奏、表演程式、服装道具及语言声韵等核心问题。对此,王亚元早已胸有成竹,明确新剧种

以蒲剧为基础构建框架,属于雏形阶段,无需追求尽善尽美。具体规划包括:聘请蒲剧艺人担纲表演,本地艺人暂不介入;沿用蒲剧平板、二性、介板等板式转换;选定《春秋配》《富贵图》等二三十出热门剧目;道白与唱词沿用蒲剧声韵,降低艺人适应难度;服装道具参照蒲剧标准,但选用真丝绸缎、人工刺绣等精品材质;创新采用祖上传下的疙瘩锣与葫芦作为主奏乐器,突出“重在唱,不在吼”的艺术特色;唱腔在蒲剧基础上,融合孝义猴儿班、太原秧歌的唱法及祖传锣鼓经典与音乐曲谱。

王亚元的创举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同与钦佩。咸丰八年(1858年)农历十月十五日之后,本地艺人与蒲剧艺人齐聚王家戏房院,其中包括“秃红”“秃丑”“盖陕西”“人参娃娃”等知名蒲剧艺人。两路艺人边排练边改革,仅用三个月便完成中路梆子雏形的创排。王亚元欣喜之余,将新戏班命名为“四喜班”,取“社会平稳、家族和睦、身健年高、剧种初创”四喜之意,同时正式将新剧种定名为“中路梆子”,以区别于南路蒲州梆子。

为庆祝改革成效,王亚元提前三天过年,设宴款待全体艺人。次年大年初一至初三,四喜班在聂店村试演;初八至元宵,赴榆次城内城隍庙戏台正式表演。起初,普通观众认为新剧种“四不像”,仅认可其精良行头与排场;但各地晋商财主却给予高度肯定,认为这是晋中商人的荣耀,不仅为民众造福,更建议戏班暂停演出,集中精力深化改革。经半年打磨排练,咸丰九年(1859年)秋天再次公演时,新剧种已获得多数观众认可。

(下转第9版)

晋中日报
晚刊版

08

人文读本

之

非遗集

2026.3.11
星期三

编辑 杜竹青
胡启龙
校对 郭娜